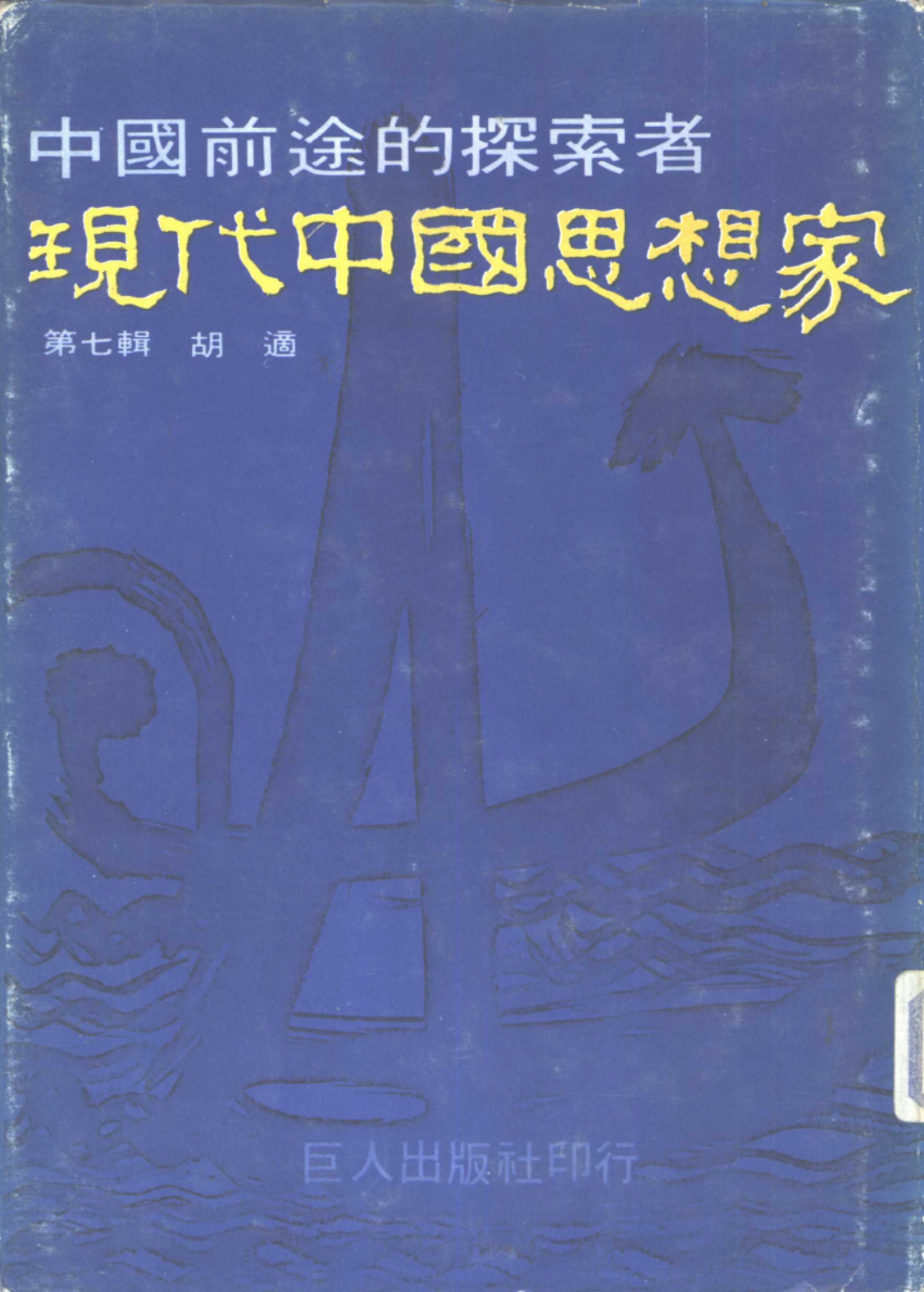


中國前途的探索者

現代中國思想家

第七輯 胡 適



巨人出版社印行

111
021

現代中國思想家

第七輯
胡適

H

1980, 7, 26.

現代中國思想家

第七輯 胡適

出版者
巨 人 行 發
社 版 出 人
連 根 黃

台北雅江街五八號
郵政劃帳戶三八一八號
電話：三二二二九二

版權・別翻印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業字〇七六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

編 撰 委 員

李榮中	李日章	王曉波
胡平生	林載爵	林瑞明
陳 驥	韋政通	段昌國
	趙天儀	陶英惠

精裝一八〇元
平裝一二〇元
實價新台幣

本書編撰委員簡介

王曉波：民國三十二年生。貴州省遵義縣人。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現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副教授。著有「先秦儒家社會哲學研究」、「象牙塔外」。

李日章：台北市人。民國廿七年生。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歷任台灣大學、世界新專講師。著有「中國哲學現代觀」。

李榮中：台灣省台南縣人。民國四十一年五月生。六十五年六月任職於「傳記文學雜誌社」，六十六年四月與友人合創「怒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並擔任總編輯。六十七年一月再創「聯鴻出版社」。現任「龍江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瑞明：筆名林梵。台灣台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著有詩集「失落的海」，傳記「楊逢畫像」。並與郭正昭合著「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

林載爵：民國四十年生。台灣台南人。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任東海大學歷史系講師。譯有「中國近百年經濟史」，著有「譚嗣同」。

胡平生：貴州黎平人。民國三十四年生。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肄業。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講師。重要論文有「陶模的政績與思想」、「梁啟超與討袁護國」、「梁蔡師生與護國之役」、「民初之復辟派」等等。

段昌國：湖北英山人。民國卅六年生。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任中興大學講師。著有「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

韋政通：江蘇丹陽人。民國十二年生。自學成功。歷任中學教員，專科、大學教授，現專事寫作。重要著作有「傳統的透視」、「荀子與古代哲學」、「中國哲學思想批判」、「傳統與現代化」、「中國文化概論」、「知識份子的責任」、「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先秦七大哲學家」、「中國的智慧」、「現代化與中國的適應」、「中國哲學辭典」、「巨變與傳統」。

陳驥：民國廿五年生。福建林森人。台灣大學文學士，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研究，美國夏威夷大學碩士，東西文化中心研究，威斯康辛大學研究，加州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師範大學，講學新加坡南洋大學。現任中興大學歷史教授、淡江文理學院講座教授。著有「美國史論集」、「西方通史」、「美國通史」。編有「美國政治傳統」等。

陶英惠：山東省德平縣人。民國二十二年生。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著有「蔡元培年譜」。

趙天儀：筆名柳文哲。台灣台中人。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曾任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並兼代系所主任。現任國立編譯館編纂。著有詩集「菓園的造訪」、「大安溪畔」、「牯嶺街」。譯詩集「黎利詩選」。評論集有「美學與語言」、「美學與批評」、「詩意的與美感的」、「裸體的國王」等。

第一輯

龔自珍
魏源
馮桂芬
洪秀全
容闓

第二輯

王韜
張之洞
鄭觀應
譚嗣同
章太炎

第三輯

康有為
梁啟超

第四輯

孫中山

第五輯

吳稚暉
蔡元培

第六輯

丁文江
張君勱

第七輯

胡適

第八輯

梁漱溟
傅斯年

現代中國思想家 第七輯

胡適 (韋政通編撰)

胡適小傳·····	(一)
胡適年表·····	(九)
胡適思想綱要·····	(七一)
胡適著作表及參考文獻·····	(一二五)
胡適論著選輯·····	(一三三)
(一)對西方思想的認識·····	(一三四)
演化論哲學·····	(一三四)
杜威哲學·····	(一四二)
易卜生主義·····	(一四八)
自由主義是什麼？·····	(一五二)

美國的民主制度·····	(一五五)
我們對西方近代文明的態度·····	(一五八)
從「到奴役之路」說起·····	(一七〇)
(二) 科學方法與整理國故·····	(一七五)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一七五)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一八六)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一九五)
新思潮的意義·····	(二〇三)
少年中國之精神(科學方法)·····	(二〇五)
致陳之藩(治學方法四字訣)·····	(二〇六)
(三) 對傳統哲學思想的見解·····	(二〇八)
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	(二〇八)
中國的傳統與將來·····	(二二七)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看法(威權與自由 的衝突)·····	(二四三)
(四) 社會問題的診斷以及改革的目標·····	(二五六)
我們走那條路·····	(二五六)

歸國雜感·····	(二六八)
新年的夢想·····	(二七五)
慈幼的問題·····	(二七六)
請大家來照照鏡子·····	(二七六)
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二七七)
「獨立評論」的一週年(獨立精神)·····	(二七九)
「科學與人生觀」序(自然主義的人生觀)·····	(二八〇)
不朽·····	(二八三)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二八四)
究竟在這二十三年裏做些什麼?·····	(二八八)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	(二八九)
貞操問題·····	(二九一)
我對於喪禮的改革·····	(二九三)
(五)文學革命·····	(二九六)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二九六)
文學改良刍議·····	(三一〇)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三二〇)

文學進化的觀念·····	(三三五)
(六) 中國的未來·····	(三四一)
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	(三四一)
建國問題引論·····	(三四七)
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	(三五四)
憲政問題·····	(三五六)
中國的傳統與將來·····	(三六〇)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三五八)

胡適小傳

一個才三歲零幾個月的男孩，就開始在家鄉一個僅兩個學童的家塾裏讀書了，因太矮小，還要大人抱上一隻高櫈子，放學的時候，再由大人抱下來。胡適就從這隻高櫈上開始讀他父親手編的「學爲人詩」：

爲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謹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學爲人，以期作聖。

經籍所載，師儒所述；

爲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返躬踐實。

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幾十年以後，胡適的確成了某些人心目中的「聖者」。令人詫異的是，從上引的部分詩句裏，竟然可以看出他一生言行的端倪。五歲喪父，但他實現了父親很高的願望。

童年，伴隨寡母過着清苦淒涼的生活，父親的遺志，和嚴格的母教，使他從小就被別人看起來「像個先生樣子」。他的母親，是個苦命而又善良的女人，十七歲時嫁給一個比她大三十歲的滿清小官吏，廿三歲這個小官吏就拋了她，和一個家口衆多的破落戶，去了，留給她的是一個稚弱的孩子，一個很難處的大家庭，還有一副沈重的生活擔子。她沒有怨言，很勇敢地站起來迎接命運的挑戰。她告訴她的孩子：「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胡適從他母親那裏承受到一件稀有的珍寶——一顆純良的心。

在鄉間童年學習的生活中，有兩件事和他後來燦爛的一生，有着密切的關聯。第一件事發生在九歲這一年，他第一次接觸到傳統的小說——一本殘闕不全的「水滸傳」，然後是一本接着一本，每看一冊就把書名記在小手摺上，到十四歲離開家鄉時，摺子上已記了三十多部小說。這些小說使這個愛看書的孩子「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也爲他後來考證小說埋下了最早的種子。

第二件事，大概在十一歲，小胡適因溫習朱子的「小學」，而念到一段司馬溫公的家訓：「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劉燒香磨，亦無所施。」這幾句話使他高興的跳了起來，「真像地藏王菩薩把錫杖一指，打開地獄門了。」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接着就點讀了「資治通鑑」，並野心勃勃地想編一部「歷代帝王年號歌訣」。誰能想得到呢？司馬光的書，竟使一個孩子形成了一個新的宗教觀，使他變成爲一個無神論者，同時也

使他一生自豪的「整理國故」的工作破了土。

一九〇四年，胡適十四歲，跟着生肺病的三哥到上海求學，踏上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

在上海六年，一共讀了三個學校。最初進梅溪學堂，這個學校的課程雖不完備，但上海這個地方，畢竟開風氣之先，青少年很容易接觸到新思潮，胡適就是在這裏大量閱讀梁啟超的書與文。有一天，同學借來一本鄭容的「革命軍」，當天晚上等舍監查完夜之後，就憑着燭光輪流抄了一本。

不久轉學澄衷學堂，這所學校完善多了，不但有較完整的課程，嚴格的管理，且有頭腦很新的教員，教國文的楊千里先生，用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做課本。這是胡適第一次讀這本書，十分喜歡。這時候仍在不斷讀梁啟超的文字，「新民說」使他知道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又使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

在澄衷讀了一年半，由於學校對英文、數學要求較嚴，遂使他這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可是離開澄衷的時候，却很不愉快，原因是班上有位同學被開除，胡適抱不平向學校抗議，無效。再寫長信力爭，仍無效，還遭學校記一大過。胡適不服，只好離開了，恰巧這時中國公學招考，一九〇六年秋季開學時，就搬進中國公學。

新環境無異是個革命大本營，其中的教員和同學，有不少是革命黨人。不過對胡適來說，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影響：中國公學提倡「普通話」，也是第一所用「普通話」教學的學校。不僅如此，同學們還創辦了一個白話報——「競業旬刊」。胡適不但藉它發表了許多白話文的習作，且當過這個刊物的主編。一個懷有無神論思想和具有強烈懷疑傾向的少年，在這樣一個新天地裏，做着這份有意義的工作，真是如魚得水。澄衷學堂的

國文老師曾在胡適的作文上批過「言論自由」四個新鮮的大字，現在他獲得實踐師訓的機會，表現得淋漓痛快，在某一篇「無鬼叢話」裏，大胆地寫下這樣的句子：「數千年來僅得許多膿包皇帝，混帳聖賢。」如果胡適在那時候，就能讀到唐甄的：「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就能讀到譚嗣同的：「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一定會拍案叫絕，讚嘆不已！

除了競業旬刊之外，胡適還在上海以外的白話報上發表了一些白話文，其中有一篇「論承繼之不近人情」，胡適在文中，不但反對承繼兒子，並且根本懷疑「爲甚麼一定要兒子」？文末說：「我如今要薦一個極孝順的兒子給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這個兒子是誰呢？便是社會。」這種社會不朽的思想，和人類各大傳統裏相信個人靈魂不朽的思想，比較起來，後者顯然是自私的。一個十多歲少年的思想，在我們中國經過大半個世紀的「現代化」以後，依然是很進步的。

一九〇八年九月間，中國公學開了一次大風潮，結果胡適和大多數同學一齊退出來，另外組織了一個中國新公學，並在新公學教低班的英文。不久新舊公學和解合併，他決定不回去，領了幾百元的欠薪，和幾個同學整天過着搓麻將、吃花酒的荒唐生活。有一天晚上，酒喝多了，醉的不省人事，和巡捕打架，被關進巡捕房。第二天，罰款後放了出來，在鏡子裏看到自己臉上的傷痕，和渾身的漏泥，不禁嘆了一口氣，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詩，心裏萬分悔恨，覺得對不起苦命的娘。就在這一天，在悔恨交加的情緒中，生命得到一次新生。

這時候已是一九一〇年，正是庚款留美考試的第二年，生命新生後的胡適，做了一次影響他一生事業的大決定：關起門來讀書，準備留美考試。結果以第五十五名中選。

從此，他開始了一帆風順的新生活。

從一九一〇年九月踏上新大陸，到一九一七年六月回國，經過七年的奮鬥，拿到哲學博士學位。在那個年代，國內風氣剛開，需才孔急，一個有學位的留學生，已是天之驕子。胡適更高同儕一籌，在尚未返抵國門之前，已爲自己佈置好舞台，即將登台扮演一個歷史性的角色。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胡適和留學美國的任叔永（鴻雋）、梅覲莊（光迪）、楊杏佛（銓）、唐璧黃（鉞）等已在討論中國文字和文學的問題，其中梅光迪最保守，正因他的觀點和胡適有很大的差距，在激烈爭辯的過程中，才促使胡適用心細想自己的立場，梅越辯越守舊，胡適被「逼上梁山」，決心走向「文學革命」的路。到一九一六年的冬季，發表文學革命思想的時機已成熟，這時候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已轟動南北，十月中胡適寫信給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八個條件，不到一個月，就寫成「文學改良芻議」，這篇文章在次年元月號的「新青年」上發表，揭開了新文學（白話文）運動的序幕。儘管胡適在新文學創作方面所做的嘗試，成績不佳，由於他適時的提倡，半個多世紀來，新文學已收到豐碩的成果，這一點胡適提倡的功績，在歷史上的地位，是完全可以確定的。

回國以後在北京大學當教授，在「新青年」發表文章，又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上冊，這些工作雖使他盛名遠播，但這時期梁啟超的時代還沒有過去，陳獨秀對知識青年和社會的影響力，正如日中天，胡適的重要性還不能和他們相比。

在白話文以外，使胡適又一次扮演歷史重要角色，是民國十八年到廿六年之間這一段，這時候國家內憂外患，正陷入嚴重危機，知識界思想分歧、混亂，有的提倡開明專制，有的提倡獨裁政治，有的迷信民族精神，此外社會主義的狂潮，正衝擊着這個古老又破敗的社會，胡適在這多重危機中，當大家心理逆退之際，

他在堅持民主自由的原則下，用他的筆和來自八方的言論奮勇作戰。這一時期，他代表着社會的正義，代表着知識份子的良心，剛強不屈地表現出他一生言論生涯中的最高光輝。到這時候，胡適在言論上才算取代了梁啟超、陳獨秀，取得領導群倫的地位。

這一時期胡適發表的文字很多，從十九年的「我們走那條路」，到廿四年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其中有許多嚴厲批評傳統文化的文章。在民十以前，胡適就寫過不少批評傳統的文字，引起的非議，也不是從這個時期才開始。所謂盛名所至，謗亦隨之。如果孤立起來看，胡適這方面的文字，可譽議之處正多。假如我們能了解一點當時的文化政策、社會景象，和思想界的風尚，對他的文字的評價就不同了。它是富有時代意義的，當政策性的開倒車的時候，胡適在大聲疾呼，指出清末民初以來，由重大的犧牲才換得的歷史方向。就中國力求現代化的大目標而言，胡適在「醜化」傳統的文字背後，有着一股巨大的願力。有充分的事實足以證明，胡適的愛國情操，絕不在任何一個民族主義者或傳統派之下。

胡適不能革命，不會做官，更缺乏做一個在野黨魁的胆識。但在民國廿七年的九月，終於做了官——中國的駐美大使，性格雖不適宜做官，在國家面臨危亡的關頭，不得不挺身而出，擔任這個重要職務，在那時候，實在是很少人能比胡適更適合擔任這個職務。接任大使以後，在爭取美國政府和人民的同情與支持上，付出了最大的心力，後來使他致命的心臟病，就因為過度辛勞在任上首次發作，住醫院七十七天。

三十一年九月，恰好任滿四年，胡適帶着心力交瘁的身子，卸下了大使的重任，仍留在美國療養。十月，在哈佛大學短期講學。結束了多年繁忙工作以後，在閒暇中着手研究水經注，要斷斷趙、戴的公案。這件學術上的公案，竟耗費了他今後十餘年大部分的寶貴時光，成為他的「象牙之塔」。五十歲以後，對一個學術

思想工作而言，正是能著作又應該多著作的成熟期，他竟選擇做水經注這個案子，這種選擇多少顯示出他在這個年齡本可免除的爭勝之心，似乎竟不能避免。胡適覺得像王國維和孟森這樣傑出的學者，在發表的「水經注疑案」的文字，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錯誤，竟至誣告古人（指戴震）作賊，所以要從頭審這場官司，打一次不平。當然，這種工作本身，有它的學術價值，可是以胡適的天資和訓練，去做這件工作，造成的損失，實不止於胡適個人。

四十六年，胡適在美國寫信給陳之藩，敘說他當時的心情和意向：「我的打算回去，是因為我今年六十六歲了（照西洋的算法），應該安定下來，利用南港史語所的藏書，把幾部未完的書寫出來。多年不寫文字了，筆下生澀得很！在自由世界裏，南港的書最合我用。」究竟是什麼原因使胡適「多年不寫文字」？不安定和藏書不足，應該都是次要的，健康狀況的不佳，算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最主要的可能是心理的退返作用——這種趨向，在辭去大使職務以後就開始了。抗戰勝利後，出席制憲國大期間，胡適的朋友傅斯年正「大談俄帝的可畏，從俄國歷史談共禍的發展可能，」那時期，勝利像隻水泡，正應着一句古詩：「山雨欲來風滿樓」，許多人都寄望於這位知識界的領袖，盼望他能有些作為。可是胡適回來了，且做了北大的校長，他却抱着多種善本的水經注，出入國大會場，這不就是心理退返的一個證據嗎？

嗣後的胡適，創進的活力消退，晚年的許多演講，內容除少數例外，大都是舊話重提，水經注和禪宗史的考證，在他生命史上的意義，正如他自己曾說過的：「人各有最明白的地方，也各有最懵懂的地方；在甲點上他是新時代的先驅者，在乙點上他也許還是舊思想的產兒。」胡適一生弄考據，竟懵懵得以為藉它在提倡科學方法。他到死都沒有察覺到，自己尚未突破清代學風所給予的影響。